

· 方法与范式 ·

中国近代国民财富测算方法的 演化及启示

缪德刚

摘要：如何实现财富增长几乎是各个时代经济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对该问题的论证不仅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分析方法的革新。对相关刊载文本的全面检索，有助于系统归纳国民财富指标及其测算方法在近代中国的演化路径。其中，存量指标“国富”的采纳与国民财富增长问题的探讨有关，而流量指标“国民所得”的运用源于国民财富再生产问题的提出与关注。基于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解答不同时期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经济分析方法变革的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思想变革的现实基质值得案例化考量，经济分析方法的总结与提炼也应当受到重视。

关键词：国民财富 财富学说 “国富” “国民所得”

作者缪德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836）。

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思想史领域关注中国近代经济学学术化发展问题的著述十分丰富，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在中国近代的传播进行探讨；^① 其二是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提炼出民生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议题并进行针对性研究；^② 其三将中国近代的某些学术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展示该学术群体在经济学领域的建树。^③ 不难发现，这些成果侧重梳理中国近代经济学学理演进脉络。

① 相关研究参见谈敏：《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示》，《经济思想史学刊》2021年第1期；M. Warner,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Economics Ideas in 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缪德刚：《经济思想转型与经济学的早期本土化——基于〈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考察》，《财经问题研究》2022年第9期。

② 相关研究参见程霖、张申、陈旭东：《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熊金武：《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以民生经济学为例（1840—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③ 相关研究参见邹进文：《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在西方的反响》，《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易棉阳：《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以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财经研究》2019年第7期；刘杰：《学术社团与知识建构——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统计学社》，《统计研究》2017年第4期。

众所周知,经济分析手段不仅有理论,还涵盖分析方法。经济学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化发展不单表现于理论层面,还包括分析方法的采纳与推广。特别是随着20世纪前期社会调查数据的获取,定量分析方法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目前,涉及该内容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近代数据的整理、校对及使用上,^①从思想史、方法论角度展开讨论的成果暂付阙如。

进入21世纪,一些学者从西方经济学说史领域,揭示了国民经济统计对于经济分析理论与方法的历史影响。福格尔等介绍了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对美国国民收入核算以及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方面的贡献,^②莱彭尼斯回顾了国内生产总值在英、美、德三国的发展及其在政治方面的价值,^③贝里斯奇梳理了法国大革命之前重农学派尝试推行的农业统计。^④此类著述大多取材于欧美国家,鲜有关注中国的相关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民财富指标开始被国人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国近代的国民财富数据自发布以后,得到了广泛引用,也产生了国际影响。这些数据主要基于两个总量分析指标呈现,即“国富”和“国民所得”。前者如高桥秀臣估算的中国部分省份的财富数值,^⑤《申报年鉴》刊载的中国“国富”数值。^⑥后者如克拉克对1925—1934年间中国“国民所得”概数的年均估计,^⑦巫宝三对1931—1936年中国“国民所得”的历年估值,^⑧刘大中对1931—1936年中国“国民所得”的历年估算,^⑨等等。

经国际统计学会、国际联盟统计专家委员会以及有关统计学者的改进、规范与推广,“国富”“国民所得”成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世界各国通行的国民财富总量测算指标,然而中国采纳它们的动因并不全然相同。中国学术界不仅将“国富”“国民所得”数值用于把握本国既有的社会经济状况,还注重通过它们量化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独具地域特质、时代特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关涉“国富”“国民所得”的系列成果先后问世,近代学者在实现国民经济测算自主化方面作出了迄今依然值得审视的先期探索。那么,在着力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今天,如何结合时代情境合理运用既有的理论与方法并实现突破创新?从这个层面上说,系统梳理并揭示“国富”“国民所得”被采纳的现实诱因和学理因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较之于已有成果,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第一,与注重经济思想史演进脉络梳理的成果不同,本文以“国富”“国民所得”两个指标在近代中国的应用为核心探讨内容,呈现经济分析方法的变革与分析工具的取舍。第二,包括国民财富指标在内的经济指标都有特定的经济思

- ① 相关研究参见龙登高、何国卿:《土改前夕地权分配的检验与解释》,《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关永强:《近代中国工业生产指数探微》,《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5期;缪德刚:《20世纪40年代中国“国民所得”估算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 ② R. W. Fogel et al., *Political Arithmetic: Simon Kuznets and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 ③ P. LePenies, *The Power of a Single Number: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DP*, trans. J. Gain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 ④ L. Behrisch, “Statistics and Politics in the 18th Century,”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 41, no. 2, 2016, pp. 238-257.
- ⑤ 《中国之富力》,《协和报》1913年第4卷第11期。
- ⑥ 《中国国富推定(一九三二年五月)》,《申报年鉴》,1933年,第M47页。
- ⑦ C. Clark,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Macmillan, 1940, pp. 44-46.
- ⑧ P. Ou, “A New Estimate of China’s National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4, no. 6, 1946, pp. 547-554.
- ⑨ T. Liu, *China’s National Income 1931-36: An Exploratory Study*,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46, p. 10.

想史含义,对它们的采纳与应用也受到了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本文借由“国富”“国民所得”两个指标,为时下从事经济学定量分析提供一些省思。第三,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国民财富指标测算推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学术化发展,而国民财富测算指标的更迭反映了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一、“国富”:财富存量指标在中国的采纳与摒弃

(一)“国富”指标使用的阶段特征

在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富”一般是国民财富的简称。作为一项经济指标,“国富”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工厂、房产、机械设备、制成品、原材料等各种财富的总和,是社会生产活动的历年累积。^①

清末维新人士通过创办杂志译介国际经济、军事、政治领域的时事,部分国家的“国富”数据由此得以刊载。1899年,在维新派主办的《知新报》《亚东时报》中,分别刊发了日、美两国的国民财富数值。日本“国富”数值来自该国学者经调研得到的概算数据,调研项目包括土地、建筑物、家畜、矿业、水产、铁路电信及水道、船舰、家具及珍器、各类会社及银行既纳资金、现金、商品等。^②美国国民财富水平为《统计公册》披露的1888—1898年人口、年收入、进口、出口、铁路公司营运状况等。^③不难发现,清末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国富”数据展示世界经济形势,并以此表达推动社会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从文献检索来看,相当数量的“国富”著述主旨介绍“国富”数据。涉及日本“国富”问题的著述较多,反映了日本长期重视国民经济测算的事实,也说明了评估日本的国家实力是当时较为关注的研究内容。此外,军事力量、对外贸易、“国民所得”、经济建设、教育等问题是与“国富”相关的热点议题。“国富”著述发表高峰时段为20世纪1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20世纪10年代中期前、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分别为增长期、式微期。结合文献的全文核心词频次分析,1899—1948年“国富”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899—1913年的引进介绍阶段、1914—1938年的评价吸收阶段和1939—1948年的比较扬弃阶段(见表1)。

在1899—1913年引进介绍阶段,“国富”著述的刊发媒介通常是维新人士、留学归国人员、教会等创办的以“某报”为名的杂志。文献内容多数为扼要介绍或列表比较日、法、奥、俄、英、德、意、美等国家“国富”数值,少有针对性分析。引介的“国富”数据来自西方学者及专门机构的估算,中国数据则来自日本学者高桥秀臣对中国部分省份的“国富”调查结果。^④

① 《国民财富》,《学习》1941年第3卷第11期。

② 《亚洲近事:日本国富概算表》,《知新报》1899年第85期。

③ “富力”代表国家的富裕程度,国家富力可以理解为“国富”。(《中外论丛:纪美国富力之盛》,《亚东时报》1899年第16—17期)

④ 有关数据可参见缪德刚:《中国近代国家资产总量——基于“国富”指标的项目整合与数据考证》,《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5期。

表1 “国富”类文献核心词频次统计

年份	类别	核心词及频次			
		1—5次	6—10次	11—15次	16次及以上
1899—1903	国外类	日本、美国			
	国外类	列国、比鲁			
1904—1908	理论类	比较			
	损益类	应用理学			
1909—1913	国内类	中国			
	国外类		列国		
	理论类	比较			
1914—1918	关系类	军力			
	国内类		中国		
	国外类	各国、美国、英国、侠泊岛			
	理论类	调查、比较、增进			
1919—1923	关系类	民富、财源			
	国外类	美国、英国、德国、捷克	日本	各国	
	理论类	增减、比较	调查		
	关系类	财产	国债		
1924—1928	损益类	欧战、赈灾			
	国内类	中国			
	国际类	德国、英国、苏联	美国	日本、各国	
	理论类	发展	调查、变动、比较		
	关系类	人口			
1929—1933	损益类	欧战、对外贸易、影片			
	国内类	台湾、康藏、上海、各县、江苏、九江、洛阳、商丘	中国		
	国际类	英国、法国、瑞士、苏联、檀香山华侨	美国	日本	各国(28)
	理论类	《国富论》、增减、方法、分配、亚丹·斯密、计划、财政、平均		调查、比较	
	关系类	国债、军力、民贫、海权、国家收入			
1934—1938	损益类	对外贸易、输出、汽车运输、人力经济、节俭、国货			
	国内类	广东、西康、各县、华北、江西、四川			中国(24)
	国际类	美国、英国	日本		各国(36)
	理论类	增减、方法、现状、农村	统计、《国富论》		比较(36)
	关系类	国际关系、国民所得、建设、民生			
1939—1943	损益类	教育、战争、对外贸易			
	国内类	中国、江西、湖南			
	国际类	日本、各国、菲律宾			
	理论类	统计、增减			
	关系类	军力			
1939—1943	损益类	来源、国货、教育、富力捐			

续表 1

年份	类别	核心词及频次			
		1—5次	6—10次	11—15次	16次及以上
1944—1948	国内类	四川			
	国际类	美国			
	理论类	统计、增减、《国富论》			
	关系类	民财			
	损益类	节约、集邮、国货			

注：“国富”类文献检索范围涵盖“国富”与“富力”两种文献，同组核心词频数递减。

资料来源：据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文献整理。

在1914—1938年评价吸收阶段，“国富”著述数量明显增加，且带有鲜明的定量分析特征。此时的中国学者热衷于讨论中国“富源”问题，并估计了中国“国富”数值。在1915年《中国实业杂志》的一则短评中，刊载了根据储蓄额推断的中国富裕程度的概数。^①1933年，《申报年鉴》发布了1932年中国“国富”估值。^②该数值一度被认为是由国人作出的中国“国富”最早估值。^③可见，中国“国富”指标的测算始于效仿国外的同类研究。在这一阶段，“国富”著述中不仅有国家之间数值的比较，也有多方估计者关于同一对象估值的综合分析。除了介绍与比较部分国家的“国富”外，通过“国富”数值进行定量分析的主题广泛但又相对聚焦，包括影响“国富”变动因素的分析、“国富”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证等。

在1939—1948年比较扬弃阶段，“国富”著述数量急剧减少，讨论主题少见有新的拓展。这一时期“国富”研究式微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因素，一是学界对“国富”作为存量指标在反映即期生产能力方面的缺陷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二是缘于同期“国民所得”估算问题产生的替代性影响。

（二）“国富”与中国国民财富增长问题

20世纪中期前，国外学者曾将“国富”用于分析国民财富的来源、测度国家经济进步水平及国别比较、完善税收结构、修正战争赔款、比对国民收入情况等方面。^④中国学者则借助相关数据，阐明中国国民财富现实状况，剖判国民财富增长的制约因素，合理化配置拉动国民财富增长的要素，并寻求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对策。简单来说，这些讨论针对的是国民财富增加与“国富”变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富”数值变动反映的国民财富增减，或国民财富增减体现在“国富”数值上的变动。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西方国家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欧美地区重商主义者、重农学派及古典经济学者所秉持的国民财富学说在中国逐渐流行。重商主义者、重农学派及古典经济学者注重经济总量问题研究，尽管他们对财富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国民财富增长是他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他们的理论视域里，经济总量提升就等于国民财富的不断累积。由此，重农学派及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说被中国学者视为“致

① 《一字一珠》，《中国实业杂志》1915年第6卷第6期。

② 《中国国富推定（一九三二年五月）》，《申报年鉴》，1933年，第M47页。

③ 丁洪范：《中国财富与收益的个人分配及所引起之问题》，《经济学报》1941年第2卷第1期。

④ C. F. Shirras：《国富之测算》，陈光照译，《统计月报》1948年第131—132号。

富之学”。^①“国富”作为国民财富存量指标，与国民财富学说存在内外表里的关联。在古典经济学衰落之后，国民财富学说及“国富”指标在经济分析理念与技术的更新中保留了下来。随着19世纪初统计方法的应用，为了更好反映国家综合发展水平，“国富”在定量分析演进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国民财富测算方法尚未被中国采纳之前，中国落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主要是基于主观判断。自19世纪末开始，一些杂志上陆续刊发“国富”数值，直观地反映了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尽管当时常被学界引用的几组中国“国富”数值只是经过粗略估算得到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学者认为，受国内外各类扰动因素影响，中国“国富”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拉大了与欧美国家的差距。^②

早在清末，部分国人已经认识到，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限制了中国国民财富增长。发展工商业是改变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的重要做法，工业化思想则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相较于工商业，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回报率低，在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易受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收益不确定性大。农业生产由于更难实现资本累积，造成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③可见，工业化思想符合国民财富快速增长的理论需求。此外，也有经济学者将中国“国富”贫瘠的原因归咎于大家庭制度中存在的大量非生产劳动力，^④或是政府对民间资本缺乏必要的保护，^⑤又或是中国经济思想中唯独视农业为生产部门，^⑥等等。这些观点看到了影响中国国民财富增长的表象，但远不如工业化思想深刻。

20世纪前半叶，“国富”类著述常见从生产视角谈论国民财富生产要素配置问题。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国民财富学说的演进与经济思想家对国民财富增长途径的判辨相辅相成。早期重商主义者将贵金属视为国民财富，重农学派则将农业生产视为国民财富的来源，斯密把经济问题研究从流通领域拓展至生产领域。在中国学者看来，斯密认为国民财富不一定是某种特定的物质，也不是某个生产部门，而是来自生产劳动。^⑦由此观之，经济分析视角从流通领域拓展至生产领域的前提是，厘清“财富”与“财富来源”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对于实现国民财富增长至关重要。从“国富”的测算项目来看，国民财富的构成要素分为非金融资产与金融资产。前者包括土地、建筑物、家畜、矿业、水产、铁路电信及水道、船舰、家具及珍贵器皿等，后者由各类金融机构的既纳资金、现金、外国公债等构成。不同国家“国富”构成各异，如1912年美国中央商业委员会的调研表明，自然资源、建筑物、动产在美国的“国富”结构中各占三分之一。^⑧部分学者论证了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性。^⑨显然，此类观点已洞悉了“财富”与“财富来源”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将二者混为一谈。

“国富”数据反映了经济变动的真实情况，成为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20世纪初，“国富”常用于论证西方国家国民财富增长的途径，以增加对相关问题定量分析的可靠性。^⑩两次世

① 王亚南：《关于经济学之几个别号的诠释》，《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6期。

② 李权时：《十年来的中国经济》，《世界杂志增刊》1931年十年刊。

③ 曾铁忱：《中国经济富力与救贫问题》，《社会月刊》（天津）1929年第1卷第2期。

④ 乔治：《大家庭制与我国国富问题》，《妇女杂志》（上海）1927年第13卷第1期。

⑤ 冯肇樑：《日本对华投资及其国富之调查》，《钱业月报》1927年第7卷第8期。

⑥ 马寅初：《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商业杂志》1926年第1卷第1期。

⑦ 徐志明：《论国富及其来源》，《新政治》1943年第7卷第2期。

⑧ 裕孙：《美国国富之一解剖》，《银行周报》1926年第10卷第27期。

⑨ 徐志明：《论国富及其来源》，《新政治》1943年第7卷第2期。

⑩ 《实业：应用理学与国富之消长》，《大陆（上海1902）》1904年第2卷第10期。

界大战前后，“国富”类研究成果的问世数量显著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学界通过研究“国富”以资备战，或论述战争对国民财富的直接影响。^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进入经济建设阶段，“国富”则用于分析工农业发展对策。^②由于战后中国极度缺乏生产资本，一些受到效用理论影响的国民财富学说被译介到中国，并提出了诸如主张通过节制享乐，将资本用于购置房产、土地乃至工厂等增加“国富”的措施。^③

不难发现，“国富”在中国近代主要用于探讨国民财富增长问题，而在反映各国发展形势、税制改革、测算人均财富水平等方面相对次要。所以，当反映国民财富再生产能力的指标——“国民所得”被逐渐接受后，围绕“国富”的探讨近乎停滞。^④

二、“国民所得”：财富流量指标在中国的发展与运用

（一）“国民所得”在中国的流行

20世纪前期，National Income可译作“国民所得”，即年度国民收入总值。受福利经济学影响，National Dividend也一度被译作“国民所得”。当然，National Income也未必全然表示“国民所得”的含义，如在19世纪中期的文献里，National Income的含义之一是国家财政收入，即National Revenue。在1953年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及其辅助表》^⑤发布前，世界各国对“国民所得”的测算极不规范，有采用生产价格者，有采用销售价格者，有的测算总值，有的估算净值，等等。甚至在很多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国民所得”也常与“国富”混为一谈。作为一项国民经济测算指标，“国民所得”用于定量分析的时间比“国富”稍晚。

1924年，《中外经济周刊》刊载了美国国民经济调查会测算的1909—1918年美国“国民所得”数据，并附有“国富”数值。^⑥1925年，《中外经济周刊》又刊发了英、法经济学者及美国金融机构调查的“国富”“国民所得”数值。^⑦除上述两则资料外，其他文献主要面世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这些“国民所得”文献中，介绍不同国家“国民所得”数值的著述占了较大比重，尤其以美国为最，反映了美国在当时“国民所得”的测算与研究方面已然领先于其他国家。“国民所得”数值变动、调查方法、财政税收等问题也受到较多关注。

从全文检索并归类计数的核心词频次来看，“国民所得”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及以前的介绍阶段和20世纪40年代的测算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相关成果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展示美、英、苏、日等国“国民所得”数值；二是探讨“国民所得”理论方面的问题，包括推计方法、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三是结合“国民所得”对租税、消费等问题进行讨论。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刘大中、巫宝三为代表的经济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成果，标志着“国民所得”在中国的研究进入

① 许性初：《论中国富源与抗战》，《东方杂志》1941年第38卷第1号。

② 冯兆卿整理：《怎样可使我国富强》，《商联月刊》1947年第4期。

③ C. F. Shirras：《国富之测算》，《统计月报》1948年第131—132号。

④ 缪德刚：《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基于“国富”学说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

⑤ UN Statistical Office, *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and Supporting Tabl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53.

⑥ 《美国国民所得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1924年第65号。

⑦ 《世界主要国家之国富比较及国民所得》，《中外经济周刊》1925年第98号。

测算阶段。这一阶段关于“国民所得”的国别研究多为结合某个专题进行论证。涉及“国民所得”理论方面的成果以解决估算层面遇到的实际问题为目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如估算方法、政府收支及侨民汇款的处理等。与“国民所得”有关的讨论主题多样，且论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主要涉及公共财政类问题，包括财政税收、储蓄投资、国际收支等领域。

表2 “国民所得”类文献核心词频次统计

年份	类别	核心词及词频		
		1—5次	6—10次	11—15次
1930—1934	国外类	苏联、各国、美国、日本		
	理论类	增减、工业所得、调查、国富、比较		
	关系类	税捐		
1935—1939	国外类	美国、苏联、日本、英国、意大利		
	理论类	理论、调查、国富、比较、方法	增减	
	关系类	租税、消费、保费		
1940—1944	国内类	中国		
	国外类	美国、各国、日本、加拿大	英国	
	理论类	增减、理论、统计、比较、方法、估计		
	关系类	所得税、增税、费用、战费、财政、支出、储蓄投资		
1945—1949	国内类			中国
	国外类	英国、苏联、日本、各国	美国	
	理论类	研究会、方法、战时、比较、凯恩斯、政府收支、侨民汇款、计划	普查、增减	理论
	关系类	工业化、借债、消费、经济恐慌、经济福利、国际收支、农业所得、投资、资本积蓄、国际贸易、政府储蓄、国民生产		

注：“国民所得”类文献检索范围涵盖“国民所得”与“国民收入”两种，同组核心词频数递减。

资料来源：据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文献整理。

(二) “国民所得”与中国国民财富再生产问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解中国经济状况，一些学者和机构估算了中国战前及战时“国民所得”。但由于估算方法尚未规范，加之缺乏与之相关的基础性社会统计数据，不同估算者得到的估值差距较大。^①其中，巫宝三等及刘大中的估值，因参考资料相对充分而流传最广，二者对“国民所得”的估算涉及农业、商业、矿冶业、金融业、制造业、营造业、自由职业、公共行政等行业。从测算结果来看，中国近代的“国民所得”低于美、英等国，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滞后于西方国家。农业所得占“国民所得”比重超过60%，说明中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制造业所得占比不足10%，反映中国工业化程度低。^②受战事等因素影响，中国战后“国民所得”较战前有所降低，国民经济结构变动不大。^③综括来看，中外学界先后估算出十余

① 有关数据参见缪德刚：《20世纪40年代中国“国民所得”估算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②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页。

③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1946》，《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第9卷第2期。

种近代中国“国民所得”估值，几乎所有数值都受不同程度的质疑，据此测算战后经济建设资本额度也莫衷一是。

中国“国民所得”估值主要用于战后经济建设资本预算，即国民财富生产问题。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资本缺乏。^①而筹划经济建设方案的可行性思路，主要是从已经具备的生产能力与可行的金融手段中估计一定时期内可能获取的资本累积额，然后将资本在各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分配。^②估计一国可以使用的经济建设资金额度通常采用四种途径：一是根据“国富”的多少衡量建设资金的高低；二是由国民资本总额计算；三是“国民所得”计算资本形成额；四是从历年投资数额计算。^③中国当时缺乏充分的“国富”、国民资本总额数据，而投资数据多为概数，“国民所得”数据几乎成为推测经济建设资金额度的唯一途径。从理论上讲，通过“国民所得”测算出可用于经济建设的国内资本额度后，其余差额可通过引进外资补足。

经济建设经费筹集是凯恩斯（John M. Keynes）储蓄投资理论的引申话题，但二者的着眼点有所差异。中国学者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例如，有观点肯定了“国民所得”对于经济建设的参考价值，同时强调凯恩斯储蓄投资理论并不适用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因为中国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并不是资金无处投资，而是缺乏国民生产需要的投资资金。^④换句话说，中国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理论适用性不同。王亚南认为，吴景超、汪馥荪、巫宝三等人依据“国民所得”对经济建设资本的测算并不适用于尚未改造的社会。^⑤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包括“国民所得”在内的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用于了解社会经济状况、制定国民经济生产计划。^⑥可见，只有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才能全面地理解“国民所得”较“国富”在中国得到更多应用的本质原因。

启 示

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不仅要以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还必须解答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当前，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诉求，加之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资源禀赋、思想文化，对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应有的贡献度和解释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理论源头之一，蕴含内容十分丰富，甚至在18世纪影响了部分西方经济学说的形成。特别是近代以后，社会的剧烈变迁使得中国经济思想冲破了藩篱，经济分析方法日趋丰富，经济思想开始学术化发展。

经济思想学术化发展通常表现为形成相对明确的研究范围和运用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国民财富测算方法在中国近代的演进，显然是呈现中国经济学早期发展路径的一个侧面。中国传

① 唐庆增：《论国富与民生》，《平论》1946年第9期。

②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杨叔进译，《大公报》1944年5月21日。

③ 曹立瀛、宁嘉凤、朱继清：《中国战后建设资金估计》，《资源委员会季刊》1944年第4卷第2期。

④ 庄德金：《国民所得与经济恐慌》，《商学研究》（上海）1947年新2期。

⑤ 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上的资本问题》，《新中华》1949年第12卷第2期。

⑥ 吴承明：《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和分析》，《新华月报》1949年第1卷第1期；中央人民政府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恢复与发展情况的公报》，《人民日报》1953年9月30日，第1版。

统经济思想蜕变与西方经济学说交织，是经济学在中国近代学术化发展的构成部分，与之同时发生的还有经济分析方法的变革，而该领域最常被学术界研究所忽视，这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立足于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本研究得到的启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需求是推动经济学在中国近代演进的原动力，因此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经济学不可须臾离的面向。国民财富测算方法的演进以中国传统财富思想转型为前提。然而，不论是传统财富思想的转型，还是国民财富指标的采纳，都以解决中国近代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为宗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各界试图通过转换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清末士人最先尝试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赋予新的内涵，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逐渐运用相对确定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经济学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学术化发展态势。到了40年代，中国学者在“国民所得”领域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代表性理论成果。学术界在当时之所以如此关注“国民所得”，要旨之一是这种估算有助于认识经济建设资金筹集问题。

其二，经济思想史蕴含了丰富的理论素材，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如今依然值得重视。例如，20世纪上半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学者重点关注财富生产问题，但仍有少数学者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分析财富分配问题。理论上，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贫富差距会影响社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降低经济发展带来的实际绩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多元化收入分配原则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但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扩大。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陆续出版了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成果。^①综合20世纪中、后期两个阶段的财富分配理论成果，或许有助于突破当前收入分配研究中的一些理论瓶颈。

其三，经济分析技术的适用性是相对于特定研究对象而言的，过去的分析方法未必毫无价值，对其进行爬梳、总结、提炼是实现经济分析技术累积的前提。20世纪中期，由于物价波动、统计技术的进步以及存量指标“国富”在反映国民财富生产方面逊色于流量指标“国民所得”，致使针对“国富”的研究一度进展缓慢甚至停滞。而到了90年代，在评估经济体潜在社会经济发展能力的理论需求下，反映财富存量水平的“国富”以体系化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新形式出现，其测算方法亦是测度国家资产负债的先行探索。作为长期存在于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国富”的项目设置也更符合历史情境中的经济结构，这对于长时段考察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变革、完善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张天悦〕

^① 魏众、王琼：《按劳分配原则中国化的探索历程——经济思想史视角的分析》，《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

· *Special Topic Study · The Boundaries and Reflections of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ctive Ignorance

Wang Ju · 79 ·

Ignorance means an absence of knowledge. However, apart from passive ignorance, there is also active ignorance in which an actor weighs different values and goals to proactively shape or maintain ignorance through actions. Cognitive subjects display epistemic agency so that active ignorance gains normative attributes. Agnotology has witnesse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active ignorance and identified three typical types: actively constructed ignorance, passively constructed ignorance and virtuous ignorance. Wilful ignorance is negative ignorance. Cognitive subjects have the obligation and ability to acquire knowledge, but they have an intense willingness to avoid acquiring it. Wilful ignorance often reveals cognitive subjects' moral or cognitive vices which may incite blame and criticism.

Laozi's Theory of "Not-Know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Chen Xin · 87 ·

It is human nature to seek knowledge, but knowledge itself has boundaries.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we do not know. In some situations, not knowing may be more valuable than knowing. In *Laozi*, there are three propositions that directly talk about "not knowing" (*wuzhi*): (1) "He constantly keeps the people without knowledge and without desire, and where there are those who have knowledge, he keeps them from presuming to act (on it)"; (2) "While his intelligence reaches in every direction, cannot he (appear to) be without knowledge?"; (3) "It is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these, that men do not know themselves." Proposition (1) emphasizes that "not knowing" of ingenuit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ell-ordered society, proposition (2) emphasizes that man is unable to know the infinite Dao, and proposition (3) emphasizes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man's inability to know the Dao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and practice of Dao. These three propositions are valuable at the social, intellectual, and practical levels.

Between Ignorance and Knowledge: Socrates in "The Apology" and "Symposium"

Hao Chunpeng · 94 ·

By comparing with the wisdom of ignorance of Socrat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fter Plato and Aristotle, seems to have embarked on a metaphysical path that gradually deviates from everyday philosophy. Philosophers began to move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the nature of man as the "in-between," wit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it "alienated" to knowledge and method as the object. This is, for Heidegger, a forgetting of the true nature of being. In a way, Socrates' wisdom of ignorance, which understands knowledge as virtue, recalls the foundations of philosophy and constitutes a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whic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cademic, intellectualized, and normative.

· *Methods and Paradigms* ·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National Wealth Measurement Methods in Modern China

Miao Degang · 102 ·

How to realize wealth growth is a common concern of economic thinkers in almost every era. A comprehensive search of relevant literature helps us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evolution path of national wealth indicators and their measurement methods in modern China. Among them, the adoption of the stock indicator "national wealth" is rela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national wealth growth, while the use of the flow indicator "national income" originates from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wealth reproduct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odern China, the answer to the real problems face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change of economic analysis methods. In this sense, it is worthwhile to consider the real nature of the changes in economic thought in a case-by-case manner, and the summarization and refinement of the methods of economic analysis should also be emphasized.

On the Evolution and Shaping of the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Shen Wei · 112 ·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law had been regard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only as the law between the so-called "civilised" countries, while from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onwards,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and even international law have become the tools for the Western countries to carry out colonial expansion. In the mid-20th century, post-war international law,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t its core, rejected the "standard of